

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

王人恩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内容摘要】台湾杜世杰先生的《红楼梦考释》是继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谡卢、潘重规等人的索隐派著作之后的一部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红学论著。其中他给贾宝玉、林黛玉找到的所谓影射的“原型”是清世祖、董小宛，我们可以看作是早就有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继续，仔细分析，杜世杰的观点仅仅是对前此索隐派观点的承袭而已，没有什么学术性。

【关键词】杜世杰 《红楼梦考释》 清世祖 董小宛 索隐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12-0082-05

台湾杜世杰先生的《红楼梦考释》是继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谡卢、潘重规等人的索隐派著作之后的一部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红学论著^①。为了证成自己的《红楼梦》“涵民族大义”，是“教汉人明礼反清之作”的核心观点，与以前的索隐派学人一样，杜世杰也在《红楼梦》人物中具体索隐了与清代历史事实相对应的现实人物，这可以看作是杜世杰的索隐理论、索隐方法的具体展开和具体运用，他几乎给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都找到了所谓影射的“原型”，其中给贾宝玉、林黛玉找到的依然是早就有人找出来的清世祖、董小宛。

“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首先提出者似为王梦阮、沈瓶庵，他们先在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第一年之第六、第七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索隐提要”，民国五年(1916)由上海中华书局铅排刊印全书，题为《红楼梦索隐》。《红楼梦索隐》的核心观点，即《红楼梦》所描写的“本事”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小说中的贾宝玉、“情僧”就是顺治皇帝(清世祖)，林黛玉即董鄂妃，也就是当年的秦淮名妓董小宛。《红楼梦索隐》的全部评点文字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观点而写就的。支撑这一核心观点的基础主要有二，一是清世祖到五台山落发

为僧，二是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那么，《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是否有事实根据呢？回答是否定的，他们不过是把道听途说来的“传闻异辞”主观地夸大为历史真实，以附会他们的核心观点。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针对世间流传颇广的清世祖出家之说和董鄂妃即董小宛之说，写有著名的《董小宛考》一文以及《世祖出家事考实》、《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二文，从根本上摧毁了《红楼梦索隐》立论的两大基础。孟森指出：“清世祖出家之说，世颇有传者。其时董鄂贵妃之故后承恩，具在《国史》。时人因董鄂之译音，定用此二字，遂颇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陈迦陵之所谓董承娇女也，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之所谓千里草也，双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于疑似之间，强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于凡姓董之人中，牵及冒氏侍臣之董小宛？”^②在这段高屋建瓴的概述文字之后，孟森引据许多史料，按年分别，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传言之妄、索隐之非。尤其是对于几个关键性问题，他都一一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顺治皇帝是否崩殂？《红楼梦索隐》说“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反，卒以成佛”^③，他们认为“言之凿凿”，

* 本文为2009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JA09148S)、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09YJA751034)之部分成果。

* 作者简介:王人恩(1958-)，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以及红学研究、钱钟书研究。

“决非虚妄”。而《清史稿·世祖纪》明载清世祖死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正月丁巳,年二十四。可见顺治没出过家,没当过和尚。大量史料表明,顺治未崩殂而出家五台山一说,纯属不根之言。二是董鄂妃是否就是董小宛?《红楼梦索隐》认为董鄂妃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宛,她到世祖身边的经历是,豫王多铎率清兵下江南,“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孟森《董小宛考》指出:

董小宛之歿也,在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戌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坟墓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輓之者有吴闼次,闻而唁之者有龚芝麓,为耳目所及焉^[2]。

这就从诸多方面说明了董小宛根本不可能入宫而成为董鄂妃,尤其是二人的年龄相差甚远,很难设想一个十四岁的皇帝把一个二十八岁的有夫之妇“纳之宫中,宠之专房”!仅此一点,即可攻破董鄂妃即董小宛一说的立论基础,更不待说还有大量的史料以证明董鄂妃决不是董小宛。孟森又引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及当时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陈维崧等人的诗文证明小宛死后葬于影梅庵,所以冒襄才写有《影梅庵忆语》抒发悲情,生掠之事,无疑出自好事者的捏造。总之,王梦阮、沈瓶庵提出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完全是道听途说、向壁虚构出来的无根之谈,毫无事实根据^[4]。

继王梦阮、沈瓶庵之后,1919年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也极力赞同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并做了部分的补充和荒谬的解说^[5]。到了1947年,谌卢发表了《红楼梦发微》,从红学发展史来看,《红楼梦发微》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说”沉寂近三十年之后又被重新论证、重新巩固、重新崛起的一篇力作,它对王、沈《红楼梦索隐》的观点既有扬,也有弃,还能独出己见,的确“不同于他作”,是精心结撰之文,非一时兴到之作^[6]。在董鄂

妃是否就是董小宛的问题上,谌卢也认为林黛玉隐射董鄂妃亦即董小宛;但是谌卢不满意于诸家对林黛玉之隐董小宛的索隐,因为在他看来“其十九多是牵强附会的”;对于孟森的《董小宛考》,他坦言“这是我所最不满意的一种考证作品”,因为“后来之欲摧残索隐工作者,动辄以此为挡箭牌”,还因为孟森“只考得董小宛与清世祖之年龄,相差十四岁”,孟森“并没有考证到‘董鄂妃’不是小宛,实不足于服人”。谌卢更进一步坦言,“现在我之所以作的工作,即以‘孟著’驳‘孟著’”。客观地说,《董小宛考》发表后,正面站出来驳难此文者,谌卢大约是第一人,也大约是唯一的人。他写了如下一段“绝妙”的文字:

孟先生主要的理论为:“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十五岁。”诚然,以初生之婴孩,决不会与十五岁之童女,有情愫谈恋爱。然小宛之歿?据其考证:“在顺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这就是《忆语》所谓病歿之年,亦即世传被掳入宫之年。清世祖此时已十四岁了。十四岁的童子,会不会和心中爱好的妇女谈情愫,讲恋爱?这倒是一个重点!

孟先生是史学家,当然要讲史的根据。我们不必多所引据,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见之史册,读书人都能知道。大抵帝皇家的子弟,都是早熟早婚的,即在世禄之家,亦多如是。即降至最近,不论南北,有些小康的家庭,往往为十三四岁的子弟早成家室,娶妇必取年长。于是,十几岁的丈夫,二十七八岁的妻子,亦不是太新鲜的事儿。这虽为讲优生学者极端反对然而风气如此,毕竟扭转不过事实。还有些大家幼年子弟,被乳媪引诱坏的,也时有所闻。此皆事实,终不得以“童子何知?”而一概否认之!

但史学家所重者,还在史实。笔者就要提说孟先生所忽略的一个大关键!先生亦提到“小宛二十八岁,清世祖犹为十四岁之童子”。并说:“小宛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是其所断为必无之事者,只有两大理由:一,世祖仅十四岁。二,小宛“年长以倍”。兹姑就此,一相商榷。

我们所据以驳倒孟说的,就是世祖十四岁之年,已非童子之身了。《清史》和《大清会典》上都有很明确的记载,顺治八年帝亲政,帝大婚。此时正当十四之年,则“童子何知”之说,便绝对的站不住。这并不算奇事,文王生伯邑考,比世祖大婚还要早两岁。且于大婚之次年,又生了武王,这都是

有历史记载的根据,亦即孟说最要命之大打击!

要说董妃年长的问题。一般以为女子一到二十八岁,早过“花信”,已是半老徐娘。但此种看法,殊不适于“天生尤物”!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夏姬为何如人?当她颠倒陈灵公、孔父父君臣之时,虽不能考实她的年龄。但以事实征之,至少应大于“二十八岁”。因为其子征舒,业已长大成人,能做弑君报辱的勾当了。此老,犹为连尹襄老所惑,甚至于甘愿丢官去国,出奔于郑以遂比翼连理之愿。宋玉《登徒子赋》所谓“惑阳城,迷下蔡。”亦即取此故实。可见自来“尤物移人”,岂必拘拘于妙龄?其次为唐武氏晚年,色犹未衰,乃能得少年之莲花六郎辈之供奉。苟计其齿,岂止年长以倍?清乾隆时,回族香妃虽于二十二岁被俘,然当太后赐死时,其年已三十八岁矣。未死之前,清高宗犹颠倒其颜色,必欲一亲芳泽,香妃恐其见逼,密缝衬衣,身藏利刃以待。清之季世,西太后以六十高龄,望之似二十许人。外国使臣之觐见者,这些都是信而有征,可考之于载籍的。

近年还有两个尤物,皆出之于北里中。其一,上海驰名四大金刚之林黛玉(后称之为老林黛玉),已届望六之年,幕后尚有青年面首数人,当我濒离沪之时,亲值之于静安寺路愚园。油头半臂,惨绿少年趋之若鹜!问其年已五十有三,丰韵真个不让花信,友人为之叫绝!其二,为北平驰名之赛金花,《孽海花》小说之惟一主人也。与安福议员魏某结婚,新闻界多为不速之客,以贺喜之名而往,亦及见嫣然一笑之媚态,时年亦逾五十,此两例皆为近事,心史先生纵曰未见。岂不闻之于脍炙之人口。何为于不及中年之小宛,独疑其香残粉褪,不足当蜂蝶之恋乎?

这段文字颇具迷惑性,因为它不仅使用了传说中的资料,而且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来论证十四岁的男子可以谈恋爱,二十八乃至五十岁的女子可以迷惑“年少以倍”的男子的观点。这一观点看似振振有辞,其实以偏概全之嫌显而易见。即使谶卢的这一观点能够成立,也“实不足以服人”,因为他“并没有考证到‘董鄂妃’就是董小宛”,尽管他还在“董鄂妃?董妃?”、“双成之诗谜”、“古意与题像诗”三则中费了不少笔墨作考证。再退一步说,即使谶卢的这一观点能够成立,不过是以野史传闻印证小说,因为他抹杀了小说可以虚构这一本质特点^[8]。

杜世杰的红学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20世纪

7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说,他应当参考了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谶卢等人的研究论著,他自己也对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三人的观点有论列,有批评,即是明证,可是他没有列出谶卢的论述。从学术规范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杜世杰看到过谶卢的著述。如果对杜世杰与谶卢的观点稍加对比,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红楼梦考释》专列一篇、分三章论宝玉,即由名号看宝玉身分、从亲属身分看宝玉的身分、从生活经历看宝玉身分,杜世杰寻找出历史文献中顺治的事迹,与小说中贾宝玉的言行排列对比,凡是相似、相近者,就做一评述,进而认定宝玉况顺治帝。例如“宝玉涵王者象征”,“因此红楼上的宝玉可真做帝王解”,“红楼作者,为说明宝玉况天子,乃又为宝玉创造一块带在脖子上的宝玉,以射玉玺”(第185页);在比较二者的“性向”时,杜世杰说:“宝玉聪明绝顶,见黛玉之诗,过目成诵,自称有一目十行之才。顺治亦然,……顺治不但聪明,且感情丰富。有些使人料想不到的表现,如《顺治实录》第1670页载,顺治冬狩至昌平,‘徘徊于思陵之旁,抚荒墟而洒涕,沥旨酒而痛心。’一百三回,宝玉想到虚无缥缈,‘不觉大哭起来。’二十二回,宝玉想到赤条条无牵挂,‘不禁大哭起来’,宝玉因虚无所感而大哭,正与顺治因荒墟而洒涕一样。”在比较二者的出家事迹时说道:

顺治削发礼佛,当时的高僧便强调顺治是佛子造世历劫,而顺治亦自信自己前世是僧,顺治死后,又经和尚主持火化,因此出家成佛之说开始流传。吴梅村并以赞佛为题,歌咏顺治礼佛经过。红楼作者便依据史实,先写顺治抛弃至尊,再写顺治之死,末写顺治成佛。(第219页)

因此,杜世杰在例举了《红楼梦》中宝玉的诸多情节、尤其是最后出家一事总结道:“综观宝玉的资历与顺治帝多所吻合”(第222页)。

显而易见,杜世杰认为宝玉影射顺治的观点并不新鲜,王梦阮、沈瓶庵、谶卢早就说过了,杜世杰只不过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工作而已。在宝玉影射顺治上面是这样,在黛玉影射董小宛的观点上面何尝不是如此呢?

《红楼梦考释》第五篇之第四章“湘妃”一节开门见山地写道:“黛玉谐韵读带欲,是情欲的化身,应扮多情人。”(第248页)接着就“潇湘妃与潇湘馆”、“进宫”、“湘妃之处境”、“祭葬”、“冥升”五个方面做了论证,认为黛玉影射董小宛。第六篇第三

章“怡红公子与绛珠草”和第四章“小宛入宫辨疑”杜世杰更为详细地排列清初正史、野史以及吴梅村、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等文人的诗文资料，与小说中的林黛玉的言行事迹作比，进而认为黛玉影射董小宛。为了否定孟森先生的董小宛年长顺治十四岁而不可能发生暧昧之事的著名观点，杜世杰有如下一段文字：

孟森之唯一有力证据是小宛较顺治大十四岁，年龄相差悬殊，不可能发生暧昧事。此殊不然，顺治生活优裕，成熟较早，对文学颇有修养，小宛为南国尤物，纵然年过三十，但秀色不亚于少女，又擅长文墨，若为顺治所得，必获宠无疑。

顺治少年时缺乏母爱，一旦逢到体贴备至的优秀女性，其恋爱成分兼有恋母情结，非一般爱情可比，如卢梭与华伦夫人，如康熙与其姑母，郑经恋其乳娘，女方皆大十多岁。

宝玉曾暗恋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傅秋芳，秋是过时，芳比美人，秋芳与秋扇义同，这说明宝玉（顺治帝）曾贪恋半老徐娘。

董妃于顺治十三年八月册封，依朝鲜使者写的《燕行录选集》下册二三五页，丙申十月初十，一段记载云：“椒闱寂寞，方拣东西两宫皇后，宫中贵妃一人，曾是军官之妻也。因庆吊出入禁闱，帝频私之，其夫则构罪杀之，勒令入宫，年将卅，色亦不美，而宠遇为最……”丙申是顺治十三年，顺治为十九岁，对于卅岁之女子而宠爱为最，这把孟森最有力之证据完全否定，反而更接近小宛之年龄，若小宛未死，则顺治十三年为卅二岁，一位绝代尤物，卅二与卅岁，也不是目力所能辨别的。如《过墟志》，太后问刘三秀青春几何，“刘以三十有五对，后曰不减少女容也。”刘三秀卅五岁，犹云少女，则闻名秦淮的尤物小宛，尚未达卅五，应更似少女。第三回黛玉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谐嫁）。”化三岁的女孩子去出家不合理。三岁盖指卅岁，顺治十一年小宛为卅岁，据给事季开生的奏言：“必有娶嫁非时，骨肉拆离之惨”。（见《顺治实录》一〇九九页）等语观之，顺治十一年，仍有抢女子之事，小宛被抢，犹非不可能之事。（第285-287页）

若稍加比较，即可看出杜世杰的这一段话与谶卢之论何其相似乃尔！在“男人可以爱恋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人”上，谶卢举出了“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的例证说“大抵帝皇家的子弟，都是早熟早婚的；即在世禄之家，亦多如

是”，而杜世杰则说“顺治生活优裕，成熟较早”，谶卢列举了夏姬、武则天、香妃、西太后慈禧、上海老林黛玉、赛金花等半老徐娘风韵犹存的例子以说明二十八乃至五十岁的女子可以迷惑“年少以倍”的男子，而杜世杰列举的是卢梭与华伦夫人、康熙与其姑母、郑经与其乳娘以说明“宝玉（顺治帝）曾贪恋半老徐娘”。客观而论，杜世杰的例证在证明在“男人可以爱恋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人”上尚不及谶卢丰富、全面和典型！也就是说，杜世杰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发展，连承袭也不够全面。即此而论，杜世杰《红楼梦考释》的学术性即可见一斑。更何况谶卢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来论证小说《红楼梦》，小说具有虚构性的特点便被他抹杀得荡然无存！在解释黛玉自己所说的“三岁”时，杜世杰竟然说成“三岁盖指卅岁”！这样任意的索隐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趋步谶卢后尘的邓狂言之《红楼梦考释》又能有多少学术价值可言呢？

邓狂言、谶卢、杜世杰等人为了索隐出《红楼梦》是写“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的需要，他们竭力否定甚至无视孟森先生在《董小宛考》中提出的种种坚实有力的证据，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说，这是非科学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注意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在这里举出一条为孟森先生所未使用的文献资料，以证明“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荒谬性。

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卷五介绍道忞《布水台诗集》时引录了道忞的《世祖章皇帝哀词》十首，其第九首写道：

万几稍暇即参谘，黄屋身居贵不知。炀广休言师智者，无忧今见拜沙弥。（自注：上因董后仙逝，作十旬佛事，凡道场中一概缁流，悉皆敬礼。）山河影射龙蹄碎，日月光腾雨洗熏。（自注：上语词臣王熙、周渔：朕因马蹶，知解顿忘，闻雨声得大自在。）顾命从容何足道，天宫归去预知时。

袁行云先生指出：“集中具史料价值者，为顺治十六、七年所作诗文。顺治帝崇信佛教，召道忞入京，命即万善殿安善结制，不时出宫就见，忘其位卑，待若宾朋。……及奉旨回鄞，顺治帝于十五日凌晨单骑至完善门，敕道忞骑马，并辔而行，亲送数百步。逾年，闻哀诏，道忞作《世祖章皇帝哀词》，详记在京所见所闻，信抵实录，可补史阙。诗中记董鄂妃死后，作十旬佛事，盖为目睹。益见清代野史记载顺治出家之妄。董妃非董小宛，亦不辨自明矣。”^⑧道忞的诗句及自注确实（下转第88页）

邻女》等。历代的爱情之歌,情意绵绵,但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是惆怅、是哀伤,是一种不圆满的爱。无论是短暂的分别,还是后会无期的永诀,都流淌着心酸的泪水,难言的苦痛。唐宋词继承了前代诗歌以悲为美的传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绮怨、哀婉为主要风格特征的悲哀型美感。^{[5][P72]}作为唐宋词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艳情词正是这种美感的典型代表。它们之中很少有欢歌笑语,而见到的只有叹息和眼泪。它们在绸缪婉转、缠绵悱恻的抒写中存在着一种凄婉伤感的情感脉流与悲剧气氛。

从社会历史原因来看,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男女的爱情婚姻没有自主的权力,真正的爱情往往遭到封建礼教的扼杀,有情人难成眷属,无情的却被捆绑成了夫妻。如陆游和唐琬的婚姻就是很明显的一例。他们两人原本情投意合,但由于陆母不喜唐琬,横加干涉,迫使他们不得不分离。陆游《钗头凤》就是抒写因离异而产生的深哀巨痛的血泪之词,它令闻者为之怆然。在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能像陆游、唐琬那样相爱的并不多见,真正的爱情往往存在于非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中,也就是文人与歌儿舞女的“走私”的感情。由于城市经济发达,歌楼酒馆林立,冶游享乐之风盛行,文人们有许多机会接触到那些女性,而文人的怀才不遇、身世凄凉与歌妓的沦落风尘、红颜薄命互相感应,时常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但是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这种男女私情因与主流文化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而经常受到无情的指责和干涉。所以,词人与歌妓出演的爱情故事刚刚拉开序幕就被扼杀在摇篮中,美好的爱情顿成悲剧。《历代词话》卷八载陆象山门人谢希孟就是一例。宋代的许多著名词人,如柳永、秦观、晏几道、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都与歌儿舞女有过缠绵的恋情,但因为社会地位的悬殊而得不到官方社会的接纳、认同与尊重,最终都只是如昙花一现,很快凋落。文人对那种“无言的结局”又偏偏难以忘怀,他们倾心于把自己的爱而不得的经历及其所引发的思绪写入词中。这样,出现在词中的便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张先《行香子》)。而伤感的离别、苦闷的相思、沉痛的怀念便构成男女情爱的主旋律。

从艳情词中的主要人物来看,以叙写美女与爱情为主要内容的词作,它们的抒情主人公或者抒情对象,绝大多数是歌儿舞妓。在城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娼妓婢妾极为兴盛的时代,她们生活在歌台舞榭、灯红酒绿之中,点缀着城市的旖旎风光,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冶游享乐如影随形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她们却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她们

可以迎来送往,声色卖笑,周旋于各种各样的男子之中,但无法得到自己平等的理想爱情。不能否认,有少数多情的文人与他们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把歌妓当作消遣的对象,或者把他们作为人生失意时的寄托。而一旦从她们那里得到了声色与情感的满足之后,便会弃之不顾,扬长而去。因此,她们遭受的经常是“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敦煌词《抛绣球》)、“从前密约已成虚,空剩得泪如珠”(赵才卿《燕归梁》)这样的悲剧性的爱情现实。文人在描写她们的美丽姿容与精湛技艺的同时,也抒写她们相恋不得的愁苦、遇人不淑的悔恨、春恨别离的孤寂、年老色衰的落拓。如“谢娘惆怅倚兰桡,泪珠玉箸千条”(温庭筠《河渚神》)、“一日日,恨重重,泪界莲腮两线红”(韦庄《天仙子》)、“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断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苏轼《菩萨蛮》)、“箏尘半妆,绡红半方,愁心欲诉垂杨”(周密《四子令》)等,突出反映了这类女性对追求美满爱情婚姻的强烈愿望与这种愿望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于是便产生了悲剧美。

波特莱尔说过:“我的美的定义,那是一种热烈痛苦的东西,又是多少有些朦胧,可以自由猜想的东西。”^{[6][P134]}唐宋艳情词所表现的男女之情既是“热烈痛苦的”,又是“可以自由猜想的”。热烈在于痴情的等待、永恒的思念、执着地追求、大胆的倾诉,痛苦则是词中主人公所追求的爱情面临阻隔或受到挫折,生命力无法舒展,“可以自由猜想的”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及其情感体验,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它合乎美的定义。唐宋艳情词的美是悲剧性的美,它能在读者那里唤起包括同情、惋惜、伤心等等感情因素在内的审美效应,使读者获得一种诗意的体验和忧郁的愉快。悲剧性美感是唐宋艳情词长盛不衰地受到读者喜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田同之.西圃词说[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王水照.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3]梁启超.情圣杜甫[A].饮冰室合集[C].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41.
- [4]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5]杨海明.唐宋词美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6]姚斯.走向接受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上接第85页)清楚无误地说明了顺治没有出家、董妃非董小宛。即此而论,无论杜世杰先生索隐得如何起劲,这一观点的基础已经坍塌了,因此,它的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 [1]杜世杰.红楼梦考释之“内容提要”[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笔者所引杜世杰文均见该书,为节省篇幅,随文只注页码。
- [2]孟森.董小宛考[M].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188、207.

- [3]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笔者所引王梦阮、沈瓶庵文,均见该书,不再另注。
- [4]王人恩.评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J].红楼梦学刊,2004(1).
- [5]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M].P173-187.
- [6]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1159-1239.下引谑卢文均出于此,不再另注。
- [7]王人恩.评谑卢的《红楼梦发微》[J].红楼梦学刊,2005(2).
- [8]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8).